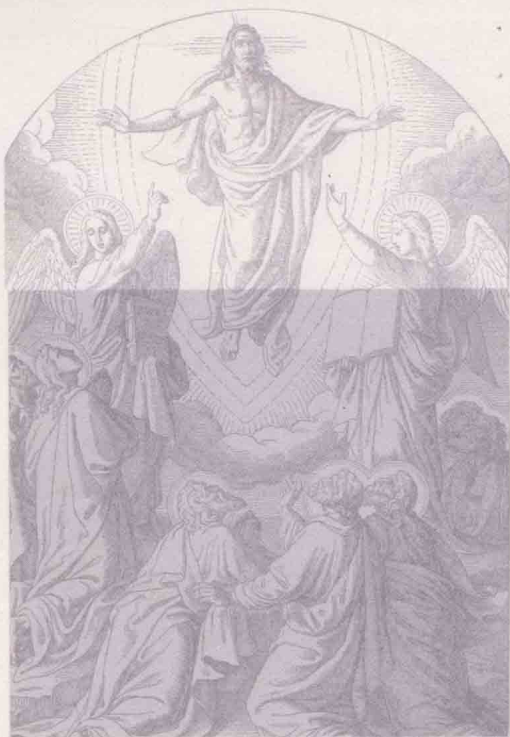


基 督 教 经 典 译 丛



G.K. Chesterton

Orthodoxy

回到正统



基 督 教 经 典 译 丛



何光沪 主编

回到正统

[英] 切斯特顿 著

庄柔玉 译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1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回到正统 / (英)切斯特顿著; 庄柔玉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1.5

(基督教经典译丛)

ISBN 978-7-108-03678-0

I. ①回… II. ①切…②庄… III. ①基督教—信仰
—研究 IV. ①B9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33387号

丛书策划 橡树文字工作室

责任编辑 张艳华

封面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年5月北京第1版
2011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635毫米×965毫米 1/16 印张12.5

字 数 165千字

印 数 0,001—8,000册

定 价 23.00元

基督教经典译丛

总 序

何光沪

在当今的全球时代，“文明的冲突”会造成文明的毁灭，因为由之引起的无限战争，意味着人类、动物、植物和整个地球的浩劫。而“文明的交流”则带来文明的更新，因为由之导向的文明和谐，意味着各文明自身的新陈代谢、各文明之间的取长补短、全世界文明的和平共处以及全人类文化的繁荣新生。

“文明的交流”最为重要的手段之一，乃是对不同文明或文化的经典之翻译。就中西两大文明而言，从17世纪初以利玛窦（Matteo Ricci）为首的传教士开始把儒家经典译为西文，到19世纪末宗教学创始人、英籍德裔学术大师缪勒（F. M. Müller）编辑出版五十卷《东方圣书集》，包括儒教、道教和佛教等宗教经典在内的中华文明成果，被大量翻译介绍到了西方各国，从徐光启到严复等中国学者、从林乐知（Y. J. Allen）到傅兰雅（John Fryer）等西方学者开始把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著作译为中文，直到20世纪末叶，商务印书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和其他有历史眼光的中国出版社组织翻译西方的哲学、历史、文学和其他学科著作，西方的科学技术和人文社科书籍也被大量翻译介绍到了中国。这些翻译出版活动，不但促进了中学西传和西学东渐的双向“文明交流”，而且催化了中华文明的新陈代谢，以及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

清末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学习、“取长补短”的历程，经历了两大阶段。第一阶段的主导思想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表现为洋务运动之向往“船坚炮利”，追求“富国强兵”，最多只求学习西方的工业技术

和物质文明，结果是以优势的海军败于日本，以军事的失败表现出制度的失败。第二阶段的主导思想是“民主加科学”，表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尊崇“德赛二先生”，中国社会在几乎一个世纪中不断从革命走向革命之后，到现在仍然需要进行民主政治的建设和科学精神的培养。大体说来，这两大阶段显示出国人对西方文明的认识由十分肤浅到较为深入，有了第一次深化，从物质层面深入到制度层面。

正如观察一支球队，不能光看其体力、技术，还要研究其组织、战略，更要探究其精神、品格，同样地，观察西方文明，不能光看其工业、技术，还要研究其社会、政治，更要探究其精神、灵性。因为任何文明都包含物质、制度和精神三个不可分割的层面，舍其一则不能得其究竟。正由于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到了20世纪末叶，中国终于有了一些有历史眼光的学者、译者和出版者，开始翻译出版西方文明精神层面的核心——基督教方面的著作，从而开启了对西方文明的认识由较为深入到更加深入的第二次深化，从制度层面深入到精神层面。

与此相关，第一阶段的翻译是以自然科学和技术书籍为主，第二阶段的翻译是以社会科学和人文书籍为主，而第三阶段的翻译，虽然开始不久，但已深入到西方文明的核心，有了一些基督教方面的著作。

实际上，基督教对世界历史和人类社会的影响，绝不止于西方文明。无数历史学家、文化学家、社会学家、艺术史家、科学史家、伦理学家、政治学家和哲学家已经证明，基督教两千年来，从东方走向西方再走向南方，已经极大地影响，甚至改变了人类社会从上古时代沿袭下来的对生命的价值、两性和妇女、博爱和慈善、保健和教育、劳动和经济、科学和学术、自由和正义、法律和政治、文学和艺术等等几乎所有生活领域的观念，从而塑造了今日世界的面貌。这个诞生于亚洲或“东方”，传入了欧洲或“西方”，再传入亚、非、拉美或“南方”的世界第一大宗教，现在因为信众大部分在发展中国家，被称为“南方宗教”。但是，它本来就不属于任何一“方”——由于今日世界上已经没有一个国

家没有其存在，所以它已经不仅仅在宗教意义上，而且是在现实意义上展现了它“普世宗教”的本质。

因此，对基督教经典的翻译，其意义早已不止于“西学”研究或对西方文明研究的需要，而早已在于对世界历史和人类文明了解的需要了。

这里所谓“基督教经典”，同结集为“大藏经”的佛教经典和结集为“道藏”的道教经典相类似，是指基督教历代的重要著作或大师名作，而不是指基督徒视为唯一神圣的上帝启示“圣经”。但是，由于基督教历代的重要著作或大师名作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绝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像佛藏道藏那样结集为一套“大丛书”，所以，在此所谓“经典译丛”，最多只能奢望成为比佛藏道藏的部头小很多很多的一套丛书。

然而，说它的重要性不会“小很多很多”，却并非奢望。远的不说，只看看我们的近邻，被称为“翻译大国”的日本和韩国——这两个曾经拜中国文化为师的国家，由于体现为“即时而大量翻译西方著作”的谦虚好学精神，一先一后地在文化上加强新陈代谢、大力吐故纳新，从而迈进了亚洲甚至世界上最先进国家的行列。众所周知，日本在“脱亚入欧”的口号下，韩国在其人口中基督徒比例迅猛增长的情况下，反而比我国更多更好地保存了东方传统或儒家文化的精粹，而且不是仅仅保存在书本里，而是保存在生活中。这一事实，加上海内外华人基督徒保留优秀传统道德的大量事实，都表明基督教与儒家的优秀传统可以相辅相成，这实在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基督教在唐朝贞观九年（公元635年）传入中国，唐太宗派宰相房玄龄率宫廷卫队到京城西郊欢迎传教士阿罗本主教，接到皇帝的书房让其翻译圣经，又接到皇宫内室听其传讲教义，“深知正真，特令传授”。三年之后（公元638年），太宗又发布诏书说：“详其教旨，玄妙无为；观其元宗，生成立要。……济物利人，宜行天下。”换言之，唐太宗经过研究，肯定基督教对社会具有有益的作用，对人生具有积极的意义，遂下

令让其在全国传播（他甚至命令有关部门在京城建造教堂，设立神职，颁赐肖像给教堂以示支持）。这无疑显示出这位大政治家超常的见识、智慧和胸襟。一千多年之后，在这个问题上，一位对中国文化和社会贡献极大的翻译家严复，也显示了同样的见识、智慧和胸襟。他在主张发展科学教育、清除“宗教流毒”的同时，指出宗教随社会进步程度而有高低之别，认为基督教对中国民众教化大有好处：“教者，随群演之浅深为高下，而常有以扶民性之偏。今假景教大行于此土，其能取吾人之缺点而补苴之，殆无疑义。且吾国小民之众，往往自有生以来，未受一言之德育。一旦有人焉，临以帝天之神，时为耳提而面命，使知人理之要，存于相爱而不欺，此于教化，岂曰小补！”（孟德斯鸠《法意》第十九章十八节译者按语。）另外两位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即胡适之和陈独秀，都不是基督徒，而且也批判宗教，但他们又都同时认为，耶稣的人格精神和道德改革对中国社会有益，宜于在中国推广（胡适：《基督教与中国》，陈独秀：《致〈新青年〉读者》）。

当然，我们编辑出版这套译丛，首先是想对我国的“西学”研究、人文学术和宗教学术研究提供资料。鉴于上述理由，我们也希望这项工作对于中西文明的交流有所贡献，还希望通过对西方文明精神认识的深化，对于中国文化的更新和中国社会的进步有所贡献，更希望本着中国传统中谦虚好学、从善如流、生生不已的精神，通过对世界历史和人类文明中基督教精神动力的了解，对于当今道德滑坡严重、精神文化堪忧的现状有所补益。

尽管近年来翻译界出版界已有不少有识之士，在这方面艰辛努力，完成了一些极有意义的工作，泽及后人，令人钦佩。但是，对我们这样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千年古国和文化大国来说，已经完成的工作与这么巨大的历史性需要相比，真好比杯水车薪，还是远远不够的。例如，即使以最严格的“经典”标准缩小译介规模，这么一个文化大国，竟然连阿奎那（Thomas Aquinas）举世皆知的千年巨著《神学大全》和加尔文（John

Calvin) 影响历史的世界经典《基督教要义》，都尚未翻译出版，这无论如何是令人汗颜的。总之，在这方面，国人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本译丛的翻译出版，就是想以我们这微薄的努力，踏上这漫长的旅程，并与诸多同道一起，参与和推动中华文化更新的大业。

最后，我们应向读者交代一下这套译丛的几点设想。

第一，译丛的选书，兼顾学术性、文化性与可读性。即从神学、哲学、史学、伦理学、宗教学等多学科的学术角度出发，考虑有关经典在社会、历史和文化上的影响，顾及不同职业、不同专业、不同层次的读者需要，选择经典作家的经典作品。

第二，译丛的读者，包括全国从中央到地方的社会科学院和各级各类人文社科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高等学校哲学、宗教、人文、社科院系的学者师生，中央到地方各级统战部门的官员和研究人员，各级党校相关教员和有关课程学员，各级政府宗教事务部门官员和研究人员，以及各宗教的教职人员、一般信众和普通读者。

第三，译丛的内容，涵盖公元1世纪基督教产生至今所有的历史时期。包含古代时期（1—6世纪），中古时期（6—16世纪）和现代时期（16—20世纪）三大部分。三个时期的起讫年代与通常按政治事件划分历史时期的起讫年代略有出入，这是由于思想史自身的某些特征，特别是基督教思想史的发展特征所致。例如，政治史的古代时期与中古时期以西罗马帝国灭亡为界，中古时期与现代时期（或近代时期）以17世纪英国革命为界；但是，基督教教父思想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仍持续了近百年，而英国革命的清教思想渊源则无疑应追溯到16世纪宗教改革。由此而有了本译丛三大部分的时期划分。这种时期划分，也可以从思想史和宗教史的角度，提醒我们注意宗教和思想因素对于世界进程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

欢笑先知：切斯特顿*

(中译本导言)

有人问切斯特顿，假如他的船搁浅在荒岛上，他最希望随身带着的是哪一本书？切斯特顿不假思索地答道：“这还用说，当然是《造船术实用指南》(*A Practical Guide to Shipbuilding*)!”假如搁浅的是我，而又容许我在圣经之外携带一本书，我会选择正在你手上的这本切斯特顿属灵自传《回到正统》。我不晓得怎会有人拿起书名如此骇人的一本书，我只知道自从某天翻开这本书，我的信仰便不再一样。《回到正统》为我的信仰带来生气及全新的探险精神，作者虽然是维多利亚时代一个重达三百磅、思想“多焦”的新闻工作者，然而，我个人的心灵探索历程，竟与作者有着奇特的相似之处。

有时候，切斯特顿被称为“没有大师级作品的大师”，这也许是新闻工作这个特定职业带给他的咒诅。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份思想周报的编辑，写过四千篇题目或琐碎或重要的文章。当现代主义、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平主义、决定论、达尔文主义及优生学等思潮锋芒崭露，他跨越了由19世纪到20世纪的转变期。他检视每一种思想，然后发现自己愈来愈靠近基督教，认为它是唯一能抵御这些强大力量的堡

* 本文改写自杨腓力(Philip Yancey)《灵魂幸存者：他们助我跨越信仰危机》(*Soul Survivor: How My Faith Survived the Church*, Doubleday, 2001) 其中一章，已获授予版权。版权所有。

垒。最终他接受了基督教信仰，不仅因为基督教是文明的支柱，更是因为它表达了世界最深邃的真理。他在一个多半是新教徒的国家，公开受洗加入罗马天主教会。

作为一个思想家，切斯特顿起步较慢。他直到九岁才会阅读，父母曾就他的智能问题求教于脑科专家。他读过艺术学校，但中途辍学，一生并未读过大学。后来的事实却显示，他有惊人的记忆力，年届高龄还能详述成千上万个曾阅读或评论过的故事情节。他写了5部小说、200篇短篇故事，其中包括一系列以布朗神父（Father Brown）为主要人物的侦探小说；又试写过戏剧、诗歌、民谣。此外，他还撰写了勃朗宁（Robert Browning）、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等的人物传记，书写了英国的历史，撰述了圣法兰西斯、阿奎那和耶稣的生平故事。虽然因写作的速度极快，弄错了不少事实，但他处理问题的那份洞察力、热忱、机智，令最苛刻的批评者也不得不站直身子，拍手叫好。

切斯特顿间或到欧洲旅游，又曾横渡大西洋到美国观光〔促成了《我在美国的见闻》（*What I Saw in America*）一书的诞生〕。不过，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中，广泛阅读，写下所接触的一切。那些欢闹的探险历程，大多发生在他巨大而不修边幅的脑袋瓜里。虽然这样，说切斯特顿对别人影响深远，绝非过誉之辞。甘地（Mahatma Gandhi）从切斯特顿汲取了许多印度独立的思想；柯林斯（Michael Collin）从他的一篇小说得着争取爱尔兰独立的灵感；而C.S.路易斯也以切斯特顿为属灵的启蒙老师。

当我初次认识切斯特顿，他已离世逾三十年了；但他复兴了我垂死的信仰，一如他对许多其他人的感染。“我正是那个可笑的人，付上无比的勇气，只不过发现了前人早已发现的事物。”切斯特顿欢欣鼓舞地宣称：“我的确试过建立自己的一套异端邪说；却在最后修订的阶段，发现那原来就是正统信仰。”

切斯特顿把今生视作一场宇宙的海难，寻找意义的人仿如从酣睡中

醒来的水手，赫然发现珍宝散布各处，而这些珍贵物品正是一个他几乎想不起的文明遗下的残迹。他把金币、罗盘、华丽服饰等残片逐一捡起，试着理出头绪。堕落的人类就是处于这样的光景：大自然、美貌、情爱、喜乐等尘世间的美事仍然带着它们存在的原本意义的痕迹，但遗忘及失忆却玷污了神在其中的形象。

继《回到正统》后，我翻阅了许多切斯特顿的作品。（他写过上百本书，大部分作品都是由切斯特顿口述，秘书笔录，然后他在初稿上作少许改动。这可让身为作家的我足足沮丧了好几个星期。）那时候，我的写作正以痛苦为题，切斯特顿的小说《名叫星期四的人》（*The Man Who Was Thursday*）对这个阴暗主题的处理，给予我很多灵感。令人惊讶的是，这本与《回到正统》风格迥异的书，竟是同年的作品。切斯特顿后来解释，他当时正苦苦纠缠于绝望、邪恶、人生意义中，甚至濒临精神崩溃。后来，他走出忧郁，设法在昏暗如斯的世界建立一个抱持乐观精神的理由。《回到正统》及《名叫星期四的人》就是他研读圣经《约伯记》的成果：一部是思辨曲折离奇的护教作品，另一部堪称结合间谍与梦魇的惊悚读物。

在《名叫星期四的人》中，切斯特顿并无贬低痛苦和自由意志那不可估量的奥秘，相反地，他把那些奥秘转化成维护信仰的论据。就是从最不利的一面看，即使世上仅存最低限度的美善，而大自然又只显露神的背面，这个宇宙仍然提供了信仰的理由。在神对约伯说的一番话中，他提及的并非友善的大自然，而是其凶猛狂野的一面——河马与鳄鱼、雷暴与风沙、母狮与山羊、野牛与鸵鸟。大自然呈现的不是别的，正是一个神秘、难以估量的神，一个“完全的他者”，配得人类的敬拜。对于现实的秘密，我们或许只能掌握一些线索，但那是何其玄妙的线索！切斯特顿后来解释：“仅仅是存在，即缩减到最基本界限的存在，也玄妙得足以叫人兴奋不已。与虚无相较，任何事物都显得壮丽动人。”

对切斯特顿来说，也是对我来说，有神的谜团总较无神的答案令人

满意。我同样相信，今生的美事是一场海难遗下的残迹，凭着这些光明的线索，人可霎见被黑暗笼罩的现实的真相。神以更多的问题回答约伯的问题，仿佛在说存在的真相远非我们所能理解。世上存留着的，除了神原本设计的残迹之外，就是一种自由，一种选择相信或离弃这样的神的自由。

就此，切斯特顿感受到的是一份不掺杂的感激，他个人的响应正活现在一首短诗中：

另一天又将消失
其中我的眼睛、耳朵、双手健在
而伟大的世界就在身边
明天又是另一天的开始
为什么我能享有两天？

除了透彻了解人类的痛苦外，切斯特顿似乎深深为痛苦的对立面——喜乐——着迷。他认为唯物论太浅薄了，不能解释尘世偶尔乍现的惊诧与愉悦，这种感觉给性爱、分娩、艺术创作等人类的基本行为，赋予了一种近乎奇幻的色彩。

为什么性爱能带来乐趣？繁殖确实无须借助欢愉：有些动物只消分裂两半就可进行繁殖，人类甚至采用不牵涉快乐的人工受孕法，就能够繁殖下一代。为什么吃喝能令人陶醉？植物和低等动物没有味蕾的奢华，仍能摄取足够的营养。为什么要有缤纷的颜色？有些人不能辨别色彩，仍能生活安好，为什么偏偏要把影像弄得这样复杂？

读了无数本有关痛苦问题的书之后，我赫然发现自己从未碰上一本谈论喜乐的著作，亦从未遇过一位对人类喜乐的经验感到万分迷惘的哲学家。然而，喜乐耸现成为一个巨大的问题：相对于基督徒的痛苦，喜乐恰恰就是无神论者的困惑。在喜乐这个问题上，基督徒绝对可以轻松

面对。一个良善而慈爱的神自然希望它创造的生物享受愉悦、欢乐和个人的满足感。我们基督徒一向以此为假设，然后寻找方法解释痛苦的起源。无神论者难道不应肩负同样的任务，解释在一个任意及无意义的世界中喜乐的由来？

踏上了漫长的心灵旅程后，切斯特顿重回信仰的怀抱，因为只有基督教能提供线索，解开这些残迹的奥秘：“首先，我打从心底里感受到世界是不会自我解释的，……第二，我感到不可思议的力量应该蕴含意义，而意义背后应该有创造意义的人。世界上的事情有如带着个人色彩的艺术品，……第三，就那个用意而言，我认为最初的设计是美好的，尽管有一些瑕疵，例如怪兽，但瑕不掩瑜；第四，最恰当表达感激之心的方式是谦卑和节制：我们当感谢神赐予啤酒和勃艮第葡萄酒，但不喝太多，以示谢意，……最后一点，也是最奇怪的一点，我的脑海浮现了一个模糊而广泛的印象：从某方面来说，一切美善之事都是从原始时代的废墟中贮藏并神圣地保存下来的。人救回了自己的美善，有如鲁宾逊从破船中捡回自己的物品。”

切斯特顿气势磅礴地一下子助我们澄清了喜乐的问题。喜乐从何而来？切斯特顿探索了不同的可能性，最后认定基督教是喜乐存在世上唯一合理的解释。喜乐的时光正是一场海难后冲到岸边的残迹，是延伸于时间轴上天堂的碎屑。我们必须轻轻地处理这些遗物，一方面应当以谦卑和克制的心加以使用，另一方面则不应视之为我们应得的而加以夺取。

正如切斯特顿所观察的，性滥交不是高估而是降低了性的价值。“抱怨只能结婚一次就像抱怨只能出生一次，与当中涉及的无比兴奋绝不能相提并论。这个抱怨显示的不是对性的极端敏感，而是异乎寻常的不敏感……一夫多妻制就是对性缺乏认识，就像一个人心不在焉地采下五颗梨子一样。”

我所参加过的教会，一向都会大声疾呼强调享乐的危害，以致我极

少听到怀着盼望的信息。在切斯特顿的引导下，我渐渐地把性爱、金钱、权力及感官享受，视为神赐给人的礼物，但在堕落的世界，这些礼物有如易爆物一样必须小心处理。我们已失掉伊甸园未受污染的纯真，如今每件美好的事物同时意味着危险，潜伏着被滥用的危机。吃沦为暴食，爱变成淫欲，一路上，我们逐渐看不见赐给我们喜乐的是谁。古时的人把美好的事物变成偶像；如今，现代人称之为沉迷。这两种情况都显示，原来的仆人变成了暴君。

每逢周日，我扭开收音机或电视都会听见传道人谴责吸毒、淫荡、贪婪，以及在美国街道上肆无忌惮的罪行。对这些显然滥用了神恩赐的行为，除了表示责备之外，我们或许应该向世界展示这些恩赐其实从何而来，好在哪里。邪恶最大的胜利也许是把宗教描绘成享乐的敌人，真相却是：我们享受的一切，都是创造主慷慨地施与世界的。

“就‘正常’一词的准确意义来说，我是正常的，”切斯特顿说，“意思是我接受秩序，对创造主和受造物的秩序，抱持一份正常的感激之情，接受创造、生命和爱是上天赐予人类永恒的美事，而婚姻和骑士制度是恰当地管理它们的法规。”在切斯特顿的影响下，我渐渐认识到一种要变得较“正常”的需要。从前，我把信仰视为一种寡言的、严酷的属灵操练，一种苦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结合，喜乐于是被白白浪费掉。切斯特顿使我重拾一种对生命活力的渴求，这种活力来自人与神的联系，正是神从无到有的创造，带给我世上万物的乐趣。

切斯特顿指出：“一个人下跌的角度可以有无限个，但叫人站住的角度却只有一个。”他最终因身体过重“下跌”，无法取得他自己滔滔不绝宣讲的平衡。他不仅在不知不觉中采下五颗梨子，甚至全数吃掉。体重徘徊在三四百磅之间，加上健康欠佳，他被取消从军的资格。这使得他受到一次唐突无礼的对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个老妇人在伦敦的街道上瞥见切斯特顿。这个爱国者愤愤不平地说：“为什么你不在前线（out at the front）？”切斯特顿自若地答道：“亲爱的女士，你如果稍稍

站过这边一点，就会看见我正‘身’在前线。”

独特的外形使切斯特顿成为伦敦讽刺漫画的宠儿。熟练的漫画家闲几笔，就可捕捉他的神韵：从侧面看，他就像一个巨型的大写字母P。这个特色，加上其他怪癖，使他的名声更为显赫。切斯特顿大部分古怪行为，跟典型的那种不修边幅、心不在焉的教授十分相似。他不结领带出席婚礼，鞋子上还黏着价签；灵感来了，他就随手捡起任何纸张，甚至是墙纸，草草写下笔记；有时候甚至浑然忘我地站在马路中央。有一次，他打电报给妻子：“在哈伯勒市场（Market Harborough），该往何处？”她打电报回复：“回家。”切斯特顿乐于跟当时的不可知论者和怀疑论者进行公开辩论，最著名的对手首推萧伯纳。那时候，一场信仰辩论足以叫演讲室座无虚席。切斯特顿经常迟到，到场后他透过夹鼻眼镜盯着自己那些凌乱的纸条，接着就开始娱乐他的观众：摆出一副紧张的神情，手指乱掏着口袋，用假音发出狂笑声。不负所望，他往往把观众都引到自己这一方，然后招待被他大惩小诫的对手到就近的酒吧庆祝。“萧伯纳就像米罗的维纳斯（Venus de Milo）像，他身上的一切都叫人赏心悦目！”说罢，就深情地为这个朋友干杯。

汉密尔顿（Cosmo Hamilton）是切斯特顿的一个辩论对手，以下是他描述的个人经验：

听着切斯特顿隆隆的笑声……看着他对我作出人身攻击后，笑弯了腰，目睹他密集地发出雌孔雀般喜乐的笑声，以运动员的精神令一群惊愕的观众沉醉在爆发的欢笑中；对诸神来说，这一切不失为一个奇景……对这个埋首字典的顽童、满口哲理的小飞侠彼得潘（Peter Pan）、幽默风趣的约翰逊博士（Dr. Johnson）、和善而华丽的小天使、渊博而有智慧的学者——我离开那房间时，多了一份自此与日俱增的尊敬和赞赏……何等怪异、巨大、奇妙、深刻、怡人！前所未闻，日后亦难得一见。

在切斯特顿的年代，严肃持重的现代人正寻求一种全新的统一理论，以解释过去，寄望将来。萧伯纳把历史视为阶级之间的斗争，提出一套社会乌托邦理论作为救世良方。根据韦尔斯（H. G. Wells）的诠释，过去正逐步往进步和启蒙演变与推移（一个大半个世纪以来饱受驳斥的观点）。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揭示了不受潜意识压抑和束缚的人类前景。讽刺的是，三位提倡进步的人都是面容严峻的。前额皱纹密布、一双瞳孔深沉而焦虑不安的他们，却娓娓陈述眼中乐观的前景。与此同时，面泛粉红的欣喜、眼睛闪闪发亮、不和谐的金胡子噗噗作响的切斯特顿，正快乐地捍卫原罪、最后审判等“反动”观念。在一个充斥着鄙视宗教的“有识之士”的社会，切斯特顿似乎本能地意识到，一个严峻的先知难以打动人心，他宁可扮演逗乐小丑的角色。

切斯特顿声称不信任“严厉、冷淡、瘦削的人”，这也许解释了我为什么愈来愈喜爱胖嘟嘟的、令人愉快的辩解者。今日的教会，正是严肃持重者的天下。福音派信徒是奉公守法的公民，大多数美国人都乐意与他们为邻，却不大情愿多花时间与他们相处。神学家拉长着脸，就“信仰当务之急”进行演说。电视布道家梳着一丝不苟的头发（往往还染上颜色），充满自信地点名谴责敌基督，预告世界末日何时来临，宣告怎样在这段时间活出丰盛而健壮的生命。宗教保守分子呼吁重整道德，基督徒普遍以节制、勤奋、功绩作为信仰的基本证明。

急于指出我们有多好的基督徒，也许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福音是带着“以善胜恶”（eucatastrophe）的姿态来到世上，那是一个极美好的事物临到极糟糕的群众身上的救赎时刻。“悔改的大多数”或“罪得赦免的大多数”，岂非较“道德高尚的大多数”更能准确界定基督徒的特质？

切斯特顿指出：“基督教理想，并不是经过试验后发现行不通，而是因为难以实现而没人尝试。”真正的问题不是：“为什么这样糟糕的基督教竟自称美好？”反之，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人世间的事情这么糟

糕仍自称美好？”切斯特顿乐于承认教会大大有负福音所托。事实上，他指出，基督徒失败的见证，正是一个支持基督教信仰极有力的论据，这正好印证了圣经有关堕落和原罪的教导。世界出了问题，正证明了教会的基本教义是对的。

《伦敦时报》(*London Times*)邀请一些作家以“世界的问题出在哪里？”为题撰写文章。切斯特顿提供了最简短和切题的回答：

编辑先生：

在我。

切斯特顿

今天，切斯特顿仍可派上用场。当文化和信仰变得愈来愈互不相干，我们不妨汲取他的才华及他使人愉快的作风，尤其是他慷慨而愉悦的精神。当社会趋于两极化，就如我们的光景，文化与信仰仿佛站在一条大分水岭的两方，互相叫嚣。切斯特顿采取另一进路：他走到吊桥中央，向任何一位欲作战的武士大声挑战；然后，他使站在两方的人都纵声大笑。纵使有不少个人的怪癖，他却充分阐扬了基督教信仰；论机智、幽默感和纯粹的智力，绝不亚于任何一个晚近时代的人。任何人若斗胆把世界从神和道成肉身的教义分割开来，他乐于亲自或借文字接受其挑战，以骑士的热忱捍卫最后的一座堡垒。

切斯特顿自己曾说，带忧伤色彩的现代社会需要不一样的先知，以前的先知提醒人类大限将至，今日的先知该提醒人类死期未到。由那个腰围宽大、笑声澎湃的先知担此重任绝对绰绰有余。艾略特(T. S. Eliot)曾作以下的评论：“说到确保现代社会一个重要的少数群体的生存……我认为他所做的较任何同年代的人都多。”我晓得他为我所做的，每当我感到信仰再次枯竭，就会走到书柜旁拿起一本切斯特顿的书；然后，探险之